

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

〔宋〕李心傳 編撰
胡 坤 點校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中華書局

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一

〔宋〕李心傳 編撰
胡 坤 點校

中 華 書 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 (宋)李心傳編撰;胡坤點校. —北京 :
中華書局, 2013.12

(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

ISBN 978 - 7 - 101 - 09566 - 1

I. 建… II. ①李…②胡… III. 中國歷史 - 南宋 - 編年體
IV. K245.04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數據核字(2013)第 179705 號

責任編輯:張 耕

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全八冊)

[宋]李心傳 編撰

胡 坤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1/32 · 127% 印張 · 16 插頁 · 3000 千字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390.00 元

ISBN 978-7-101-09566-1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點校說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是現存最重要、最詳盡的記載南宋高宗一朝三十六年史事的編年體史書，由南宋史學家李心傳所撰。其成書後，即備受重視，宋寧宗嘉定三年（一二一〇），朝廷嘗下指揮，令李心傳之弟道傳繳進繕寫好的淨本，以備參照編修正史〔一〕。由於該書卷帙浩繁，雖在理宗寶祐元年（一二五三）刊刻於揚州，然流傳不廣，其所以不絕如縷者，全賴先後有永樂大典、四庫全書之收錄，方為今日之研究者所習見，成為宋史研究基本史籍之一。

一、關於本書的撰者李心傳

本書撰者李心傳（一一六七—一二四四）字微之，又字伯微，號秀巖，又號秀巖野人，晚年自號雪濱病叟，世稱秀巖先生，隆州井研人。心傳出身經史世家，其曾祖李公錫雖未曾仕進〔二〕，卻「望重鄉評」〔三〕，「學擅一家」〔四〕，是當地頗有名望的學者。祖父李發曾仕至京官的宣義郎〔五〕，雖階位不甚顯赫，卻能「泝家傳而可想」〔六〕，保其家學而不墜。到了其父李舜臣之時，「嘗主宗正寺簿，以文名」〔七〕，不但進一步提高了家聲，而且也為他的兒子們未來的騰飛奠定了基礎。舜臣有三子，長子心傳，仲子道

傳，季子性傳，皆知名於當時^{〔八〕}，與其父舜臣並稱「井研四李」，名重蜀中。心傳撰述本朝歷史之志向，早在其青少年時期就已確立，據李心傳自己說，其在十四五歲時，嘗隨父至臨安，「頗得窺玉牒所藏金匱石室之副，退而過庭，則獲剽聞名卿才大夫之議論」^{〔九〕}，每念及南渡以來，紀載未備，明君、良臣、名儒、猛將事蹟之不彰，典章制度源流因革之失墜，憾由心生，遂慨然有著述之志。宋寧宗慶元初，心傳科舉失意，遂「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一〇〕}，於開禧元年（一二〇五）秋冬之際完成本書^{〔一一〕}。心傳一生著述甚豐，有關其生平、著述，學界已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茲不贅述^{〔一二〕}。

二、關於本書的書名

本書的書名，據四庫館臣在本書的提要中說：

至其書名，文獻通考作繫年要記，宋史本傳作高宗要錄，互有不同。今據永樂大典所題，與心傳朝野雜記自跋，及王應麟玉海相合，故定爲繫年要錄，著於錄焉。

從這段話中可以知道，關於本書書名，各方記載各有參差，因永樂大典所題與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自跋及王應麟玉海相合，所以定名爲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然而館臣的這段說明並不令人十分信服，例如館臣所說李心傳的自跋，就未曾見於任何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的版本中，而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序中卻提到了「會有旨給劄，上心傳所著高廟繫年」，因此也引出了後世關於本書原名問題爭

論的一段公案。

學界首先提出本書原名問題的是陳智超先生，陳先生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中國古代史史料學第六章宋史史料中介紹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時說：

至於本書的書名，據雜記卷首所載當年宣取要錄的指揮，多作高宗繫年要錄，但自四庫全書定爲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以後，後人一直沿用這個名稱。其實，本書只記高宗一朝史實，應以高宗繫年要錄爲正。

隨後，陳智超先生又將「復本名」的問題再次提出，除了堅持之前的論斷及證據之外，又補充提出：「永樂大典的題名只是繫年要錄，而未明確是「高宗」還是「建炎以來」，「正因爲它原名高宗繫年要錄，而又收在「高宗」事目中，永樂大典編者爲了避免重複，所以只題爲繫年要錄。」〔三〕

對於陳智超先生關於「復本名」的論斷，梁太濟先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梁先生認爲，「李心傳書的全名爲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係作者本人命名，簡稱繫年要錄。至於「高宗皇帝繫年要錄」，嚴格說來，只「繫年要錄」是書名，而「高宗皇帝」則表示其書某一部分內容範圍的限定性稱呼」〔四〕。對此陳智超先生回應稱：「如果按他（指梁太濟先生，引者注）所說，「繫年要錄」是「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這一書名的簡稱，「高宗皇帝繫年要錄」的全稱就應是「高宗皇帝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殊不知，「高宗皇帝」（或「高宗」）與「建炎以來」作爲指示時間的詞語時，是兩個互相排斥的概念，不能重疊使用。」〔五〕並重申己見，且有針對性地解釋了「建炎以來」、「中興」等詞的含義。

隨後，孟彥弘先生針對陳、梁二位先生關於本書書名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並對本書書名做出推斷：

李心傳計劃撰寫的全書名稱爲「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當他剛完成高宗一朝時，朝士請求朝廷下令，命心傳將這一部分奏進。他們怎樣來稱呼這部書呢？他們顯然不能用心傳所擬的全書的書名來指稱剛完成的其中一部分；於是他們就用「高宗一朝編年」、「高宗一朝」等來指稱。作爲作者，李心傳也不太可能用大家都已知道的，他正在撰寫中的此書的全名來指稱剛完成的這一部分，但在奏進時，又不能不作題名；於是他也使用了廟號——這也符合一個朝代的在位皇帝對其先帝，以及時人對實錄、日曆等稱呼的慣例。如果在他所進奏的書上，用「繫年要錄」來體現全書，用廟號來表示其中已完成的一部分，作「高宗皇帝繫年要錄」或「高宗繫年要錄」，這當然是最有可能的。^{〔六〕}

並進一步提出：

李心傳在奏進題名時，最可能的處理辦法，或許是採用南宋刻書小題在上、大題在下的方法，將「高宗皇帝繫年要錄」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同時寫在進呈清本中；這恐怕纔是李心傳在奏狀中籠統地說「名『繫年要錄』」的原因。正因爲「高宗皇帝繫年要錄」或「高宗繫年要錄」不是書名，更不是「定名」或「原名」，因此在刊刻此書時，沒有像對待實錄或日曆那樣，以廟號定名，作「高宗皇帝繫年要錄」或「高宗繫年要錄」；而是使用了李心傳對整個全書的定名，爲「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七〕}

孟彥弘先生的看法在上述兩段引文中表述的很清楚，在此就不作過多解釋，總體上說來，孟彥弘

先生比較傾向梁太濟先生的觀點。

爲此，陳智超先生又發表了四論今本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的原名一文〔一八〕，對梁太濟、孟彥弘兩位先生的觀點予以回應，並堅持高宗皇帝繫年要錄是本書原名的論斷。

實際上，有關本書原名問題的闡述和討論，並不僅局限在梁、陳、孟三位先生之間。譬如王德毅先生在爲一九八〇年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廣雅本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所書寫的題端中稱：

心傳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起自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初未定其所止，而是逐帝編述的。先完成的是高宗一朝三十六年史事長編，共二百卷，所以稱爲高宗朝繫年要錄。

從王德毅先生的這段敘述中，似乎表明王先生認爲本書的原名當是「高宗朝繫年要錄」。又譬如王瑞來先生在一九八七年發表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略論一文〔一九〕，也提到了本書原名的問題，他談到：

我認爲此書記作高宗皇帝繫年要錄較爲準確，也符合李氏原意……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當是李心傳這部書的總名，而高宗一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被稱作高宗皇帝繫年要錄。

綜觀有關本書書名的討論，可以看到，各家關於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是李心傳計劃撰寫全書的總名這一點是沒有疑義的，然而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記載高宗朝三十六年史事的這一部分到底叫什麼名字，則出現了很大的爭論。以梁太濟先生爲代表的一派，認爲仍叫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而以陳智超先生爲代表的一派，則認爲應該叫做高宗皇帝繫年要錄。囿於史料之限，有關本書原名的爭論並沒有達

成一致的見解，在此姑且存疑，而不必強行求同。

綜合各家觀點，筆者於此雖無甚發明，但也想藉此略談管見。筆者比較傾向於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是本書原名的觀點。目前用以研究本書原名的核心史料，無非是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首所錄的三通指揮與一通公牒，本書成書之後的官私著錄，宋史李心傳傳，以及賈似道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序（包括乙集的序）。由於對「高宗皇帝繫年要錄」中「高宗皇帝」到底是「繫年要錄」這本書的限定性稱呼，還是根本就是書名的一部分，理解有歧互，從而出現對本書原名問題爭論的局面。在沒有出現決定性史料之前，恐怕關於「原名」問題的爭論，很難達成一致。

在現有史料的前提下，據筆者淺見，如果沒有嘉定三年（一一二〇）朝廷宣取繫年要錄一事的出現，恐怕在李心傳的概念中就不會出現「高宗皇帝繫年要錄」這樣一個名稱。因為在李心傳的觀念中，高宗一朝史事的修撰，既不是完秩，也不能算作是階段性成果，如果沒有朝廷的宣取，李心傳大約不會想到要為這部分內容單獨取個名字。但是朝廷既然要宣取這部分內容，在發出指揮的時候就需要用一個名字來指代這部分內容，「高宗皇帝繫年要錄」顯然就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名稱。而李心傳在奏進的時候，當然不能採用計劃寫作的書名，「建炎以來」與「高宗一朝」相差甚大，的確存在名實不符的情況，更何況原計劃中的「部分內容」如今要獨立成書，自然要有一個名實相符的名字，方能奏進，而「高宗皇帝繫年要錄」這一名稱，自然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因此從目前的史料中，大約是可以得出李心傳在奏進時採用的是高宗皇帝繫年要錄這一書名的結論。

但是高宗皇帝繫年要錄這一書名算不算原名，是不是心傳的本意，恐怕還是有討論餘地的。首先，相比於高宗皇帝繫年要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之名更爲原始，至少從出現的先後順序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的名稱就要早於高宗皇帝繫年要錄；其次，高宗皇帝繫年要錄的書名，從現存史料來看，並不能排除是朝廷強加給李心傳的。基於以上幾點，筆者更傾向於認爲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是本書的原名。

無論關於本書原名問題的討論孰是孰非，自四庫館臣定名爲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以後，此一書名就已深入人心，廣泛爲學界內外所熟知，即如堅定認爲高宗皇帝繫年要錄是本書原名的陳智超先生也曾經說過：「將來要錄如有點校本，是否恢復原名，可以再討論」^[10]，因此在更有力的證據出現之前，亦不必爲此糾纏不清而徒惹紛紛，故本次點校，仍以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作爲本書的書名。

三、關於本書的取材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書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這也是自其成書以來，至於今日之學術界的共識。本書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與李心傳在編撰此書時的取材有着密切且直接的關係。本書取材廣泛，徵引賅富，自其成書後，即因此點而備受推崇。

李心傳的好友許奕就曾稱讚本書「纂輯科條，編年記載，專以日曆、會要爲本，然後網羅天下放失

舊聞，可信者取之，可削者辯之，可疑者闕之，集眾說之長，酌繁簡之中，久而成編，名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11〕}

四庫館臣讚曰：「其書以國史、日曆爲主，而參之以稗官野記、家乘誌狀、案牘奏議、百司題名，無不臚採異同，以待後來論定。故文雖繁而不病其冗，論雖歧而不病其雜，在宋人諸野史中，最足以資考證。」^{〔12〕}

孫原湘讚曰：「特就高宗一朝之事，重加纂述，以國史、日曆爲主，而參之以稗史、家乘。其有纖悉異同之處，臚採諸說，折衷以求其當，或云『不取』，或云『從之』，或云『當參考』。詳審精密，較之李巽巖長編，用心尤過之，無論熊克、張鑑也。」^{〔13〕}

蕭藩在其刊刻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的跋語中稱：「是書記高宗一朝故事，編年紀月，蓋以日曆、小曆爲本，廣收博采，最爲贍富。參稽鉤考，非但足以補證宋史，事實具備，尤有裨於經世之學。」

以上諸家對於本書取材之讚語，可謂實至名歸。據聶樂和先生的研究，本書所參閱的資料，據不完全统计，總數也達到了八百六十六種^{〔14〕}。一九九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時，在該書的第四冊，裴汝誠等先生編製了要錄所見書名篇名索引，據孫建民先生統計，「共使用官私文獻四百九十餘種，其中，官方史書三十五種，文集、別集三十餘種，另外，尚有百司題名五十種，單篇詩文四十種」^{〔15〕}。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影印本書所寫的出版說明中則說：「據我們統計，它直接和間接引用書籍、篇章多達五百五十種左右。」不知上海古籍出版社所作出的論斷是

不是基於裴汝誠等先生編製的索引而作出的統計，不過據筆者估計，本書所參閱的資料大約在五百餘種，應該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在如此龐大的引書中，有相當一部分今日已經亡佚，本書在客觀上起到了保存資料的作用。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心傳在修撰本書的過程中展現出了高超的取捨和駕馭資料的能力，在眾多記載紛繁，歧異互見的官私之書中，臚採異同，明辨真偽，將豐富蕪雜的官私資料恰如其分地融入到本書中，切實做到了「文雖繁而不病其冗，論雖歧而不病其雜」。這不但是李心傳史才、史學、史識的體現，也是本書為歷代所稱頌的原因之一。

本書的取材固然有其贍富的一面，但也應該注意到，李心傳編撰本書時，最主要的參考書目其實並不多。按照前引諸家的說法來看，許奕認為本書的主體是參閱了日曆和會要，四庫館臣和孫原湘則認為本書是以國史和日曆為主要參考書目，蕭藩則認為是以日曆和小曆為本，可謂是言者紛紛，但可以肯定的一點則是某幾部書是李心傳在編撰本書時主要的參考資料。那麼這「某幾部書」到底是哪些書呢？實際上，後來的一些研究者仍然受到前引諸家成說的影響，沿襲了之前的說法，如來可泓先生即認為：「要錄的材料來源，是以高宗朝的國史、日曆為主，並參考大量私家著作而成」^{〔二六〕}，沿襲了四庫館臣和孫原湘的成說；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書的出版說明則說：「其正文以高宗日曆、實錄、國史和會要為本」，則是綜合了各家的說法。

實際上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聶樂和先生便對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書的取材問題有過較為深入

的研究^{〔二七〕}。聶先生首先將本書所參閱材料之篇目、書名條列出來，並對每一種資料引用的頻次進行了統計，將其歸納爲如下三點：

一、官修史書僅日曆、實錄、玉牒、國史等少數幾種，其餘絕大多數是公私檔案、私修史書、碑誌行狀等。

二、各種奏狀、劄子及當時人親歷記載這些第一手資料，在種類上超出了後人追述、編纂的第二手資料。

三、參閱次數最多的是高宗日曆，共八三六次，而大量的資料僅參閱一次。在所有資料中，參閱次數超過一〇〇次的，只有高宗日曆（八三六次）、中興小曆（五五三次）、中興遺史（三一七次）、秀水閑居錄（一一五次）、揮塵錄（一〇三次）五種。其中僅一種爲正史。

並進一步據此認爲，「要錄在編纂過程中，僅以官修史書爲大綱，而實際上主要是依據檔案材料和私人撰述編纂而成」^{〔二八〕}。聶樂和先生是通過較爲精確的統計進而得出的結論，因此這個結論是可信的^{〔二九〕}。從這個結論我們可以看到，之前有關本書取材的種種說法中，大體以蕭藩的認識最爲中的。

在這裡似乎有關本書主要取材爲何的問題已經解決，但還有一個問題值得追索：爲何會有觀點認爲國史和實錄亦是本書主要取材的來源呢？對於這一問題，梁太濟先生有過精深的研究^{〔三〇〕}，在此不妨將梁先生的主要觀點做一介紹：

第一，本書不可能從國史取材。本書若從國史取材，則只能是記載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史

事的中興四朝國史（又稱淳祐四朝史），中興四朝國史成書晚於本書，故本書不可能從國史中取材。「正因為要錄自注中曾屢屢言及『國史』，尤其是『史』，雖然其具體所指，在高宗朝史事與其前之徽、欽兩朝相接部分確有指稱四朝國史（引者注：這裡的四朝指神宗、哲宗、徽宗、欽宗）的情況，而絕大多數卻是泛指日曆、實錄等一般官修史書而言的，四庫館臣不察，遂誤以為國史與日曆同為要錄的主要取材之書。」

第二，本書沒有發現從實錄取材的實例。與本書記載內容相對應的是高宗實錄，而本書提及「實錄」之處多不是指高宗實錄。另外本書自注中單獨提及「附傳」之處多是指高宗日曆的附傳。

第三，本書主體框架的依據是高宗日曆。

第四，中興小曆是本書的主要依傍。

梁太濟先生的研究結果再度證實了聶樂和先生的研究結論。這裡還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即使四庫館臣及今日之研究者所提及的「國史」和「實錄」是泛指歷朝之「國史」、「實錄」，但從本書李心傳自注中所反映出的使用頻次來講，也遠遠構不成本書的主要取材來源。另外，許奕在奏狀中提到會要是本書取材的另一個主要來源，梁太濟先生認為，「許奕因為是在進書奏狀中言及要錄取材的，當然要強調以本朝官典為本，借以抬高其在官方眼中的權威性和可信性。實際上，會要的作用遠在小曆之下。」^[11]梁先生的這一看法與筆者點校時所得到的直觀感受很一致（由於時間關係，未作精確統計），會要的使用頻次并不高，在校勘的過程中，以今本宋會要輯稿所作出的校勘的情況也不是很多，因此

《會要》也不是本書取材的主要來源。

結合聶樂和先生與梁太濟先生的研究成果，以及筆者點校本書的實踐，有關本書取材的問題，更傾向於認為：本書以官方史書高宗日曆構建主體框架，以私修史書中興小曆和中興遺史做為完善這一框架的主要依傍，同時參閱了大量的官私史書、私家誌狀、案牘奏報、百司題名等，經過臚採異同、明辨是非後，將其融入到本書中，從而形成了本書詳審精密而又不蕪雜繁冗的鮮明特色。

四、關於本書的流傳及版本

關於本書流傳的情況，聶樂和先生有比較詳盡的研究^{〔註1〕}。聶樂和先生認為本書的流傳經過了三個階段，即嘉定三年（一一二〇）本書奏進至寶祐元年（一二五三）賈似道刊刻本書於揚州，是為第一階段；本書有寶祐元年刻本後至清修四庫全書時，是為第二階段；第三階段則是四庫全書成書後。這一分期法是根據現有史料對本書流傳記載的實際情況劃分的，在沒有新史料發現之前，這樣的分期還是有助於我們對本書的流傳情況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下文則以此為基礎，對相關問題進行介紹。

第一階段，嘉定三年至寶祐元年。

嘉定三年九月，朝廷欲修高宗朝國史，遂下指揮令李心傳將繕寫好的淨本高宗皇帝繫年要錄交付

其弟太常博士李道傳，由李道傳繳付國史院。適逢四川宣撫使楊輔被命召赴臨安，楊輔遂攜帶李心傳繕寫好的淨本一百卷凡五十冊，擬進上。然而楊輔中道改除鎮江府，進書之事未果。延宕至嘉定五年（一二一二），時新除潼川府路安撫使的李心傳友人許奕方正式奏上高宗皇帝繫年要錄一百卷五十冊。由此可見，許奕奏進的就應該是楊輔奏進未果的嘉定三年鈔本，這也是本書進入流傳渠道的第一個版本。^{〔111〕}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的高宗朝部分在奏進之後是否有過刊刻或者有其它鈔本？據寶祐元年賈似道在揚州主持刊刻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時所寫的跋語稱，揚州刻本是根據賈似道家藏蜀本繫年錄二百卷刊刻成書的。從賈似道的跋中可以看到，此次刊刻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的記事亦是高宗一朝，而卷數則已經從一百卷變成了兩百卷。這種變化是怎樣發生的呢？

今日我們所看到的宋史藝文志是合宋代四部正式修成的三朝國史（太祖、太宗、真宗）、兩朝國史（仁宗、英宗）、四朝國史（神宗、哲宗、徽宗、欽宗）、中興四朝國史（高宗、孝宗、光宗、寧宗）中的藝文志，並加以纂修而來，其中著錄有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114〕}。顯然這段記載的來源是中興四朝國史藝文志。李心傳曾參與纂修中興四朝國史的「帝紀」部分，而中興四朝國史最終修成進上的時間是理宗寶祐五年（一二五七），此時距李心傳亡故已經過去了十三年。有沒有可能在李心傳生前，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經李心傳重新勘定為兩百卷呢？這個可能當然是有的，但卻無法確定。因為從現存史料來看，兩百卷本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最早見於記載就是寶祐元年賈似道的跋，而此時也距